

中亚学刊

● ZHONGYA XUEKAN



● 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编

1

中 亚 学 刊

第 一 辑

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编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1983 年 · 北京

主 编: 马 雍
本期编辑: 王 译 宋 峴 余太山
 吴 焯 杨 讷 康右铭
 黄振华 谢 方 谢孝革

中 亚 学 刊

第 一 辑

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编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 18¹/₄ · 印张 · 1 插页 · 342 千字

1983 年 12 月第 1 版 198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200 册

统一书号: 11018·1233 定价: 1.75 元

中 亚 学 刊

第 一 辑

目 录

发刊词	陈翰笙 (1)
关于“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的新认识	俞伟超 (3)
从阴山岩画看内蒙古草原古代游牧人的文明	盖山林 (23)
汉婼羌国考	周连宽 (81)
喉哒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余太山 (91)
克孜尔石窟壁画裸体问题初探	吴 焯 (116)
论突厥事火	蔡鸿生 (145)
波斯古典诗歌奠基人鲁达基	王家璞 (150)
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三卷研究	李经纬 (180)
喀喇汗王朝与宋、辽及高昌回鹘的关系	魏良弢 (212)
西夏文字典《文海》、《文海杂类》及其研究——兼谈从西夏 文文献看西夏社会概况	黄振华 (224)
元代曲先塔林考	刘迎胜 (243)
清朝前期准噶尔与内地的贸易关系	蔡家艺 (253)

JOURNAL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 VOLUME I

CONTENT

Preface	Chen Han Sheng
A New Approach to Kayue Culture and Xindian Culture	Yu Wei Chao
Ancient Nomadic Civilization in Inner Mongolia as Seen in Yinshan Petroglyph	Gai Shan Lin
A Study on Nuoqiong Kingdom in Han Dynasty	Zhou Lian Kuan
Some Problems in Ephthalite History	Yu Tai Shan
Preliminary Study in the Nudes on Wall-paintings of Kizil Cave.....	Wu Zhuo
On Fire Worship of the Turk	Cai Hong Sheng
Rūdagi—Founder of the Persian Classical Poesy	Wang Jia Ying
Studies in Uighur Version of Maitreyasamiti, Chapt. III, Discovered in Hami	Li Jing Wei
Karakhanids in Relations to Song and Liao Dynasties, and to Kočo Uighurs	Wei Liang Tao
Tangut Dictionary Wen Hai and Its Study—Tangut Society Seen in Tangut Sources	Huang Zhen Hua
Notes on Kūsān Tarin in Yuan Dynasty	Liu Ying Sheng
Commercial Relation of Zhungars with China Inland in Early Period of Qing Dynasty	Cai Jia Yi

发 刊 词

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理事长 陈翰笙

《中亚学刊》是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创办的一种不定期学术杂志。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成立于1979年冬，随即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资助的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作为一个集体成员。这里的“中亚”一词，系指其广义而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全部或部分属于中亚地区的国家共有七个，即：阿富汗、中国、印度、伊朗、蒙古人民共和国、巴基斯坦和苏联。就中国来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河西走廊、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地都属于中亚地区范围。中亚是一个纯地理名词。自古以来，中亚即分属于各个不同国家，其中一部分地区是中国的领土，其他地区也和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

中亚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不仅中亚地区国家的学者研究它，非中亚地区的国家也有不少学者从事于这方面的研究。近几十年来，中亚学更引起国际学术界很大的兴趣，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的中亚学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早在先秦时代，对中亚若干地区已有零星的报导。生活于公元前二世纪时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根据张骞的出使报告而在《史记》中写下了《大宛列传》，这应是世界上关于中亚学的第一篇科学著作。两千年来，中国历史文献和其他各种著作中保存了大量有关中亚的重要资料，这些资料成为研究中亚学不可缺少的基本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中亚学也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在考古发掘和民族调查方面，成绩尤为突出。

然而，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各国的中亚学都有着自己的贡献、特长和不足之处。中亚所包括的地域范围很广，中亚学的内容特别丰富，研究中亚学的难度也比较大，单靠任何一个国家的学者是不可能对这门学科进行全面、深入、彻底的研究的。因此，促进各国中亚学的交流与合作已成为推进这门学科刻不容缓的任务了。

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创办《中亚学刊》的宗旨就是为了推动中国中亚学的发展，传播中国中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亚学的内容范围很广，包括历史、考古、民族、民俗、语言、文

学、艺术、宗教等各个方面。限于篇幅和出版条件,本刊所发表的论文仅能反映出有关方面的极小一部分成果。目前,国内学术刊物多如雨后春笋,在其他杂志上还发表了许多与中亚学有关的重要学术论文;本刊亟愿与这些刊物进行交换,使我们有更多的学习提高的机会。

本刊的撰稿人不限于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的会员,对于踊跃投稿、积极支持本刊的同志,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本刊创刊号承中华书局同意接受出版,并承该局编辑、出版工作同志给予我们以多方面的协助;本刊又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历史研究所在财力、物力、人力方面给予我们以大量的支援。没有上述这些单位和工作人员的援助,这个刊物是不可能和各位读者见面的。我们对此特别需要致谢。

本刊没有专职的编辑,所有编辑工作均由少数会员利用业余时间承担。由于经验不足,水平不高,编辑工作中的错误与疏忽一定很多,希望得到国内外学者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一九八二年,九月,北京。

关于“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的新认识

俞 伟 超

- 一 关于卡约文化的基本内涵与类型问题
- 二 关于卡约和寺洼文化的来源问题
- 三 关于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的关系问题
- 四 关于卡约、寺洼、辛店的族属及其对中原文化的影响问题
- 五 关于甘青高原地区由锄耕农业向畜牧经济转化的问题

人类的文化,由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会造成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而不同的历史、民族传统,又会使类似的经济文化类型,形成不同的文化系统。在一般情况下,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考古学遗存,往往不属于一个文化系统;而一个文化系统的各遗存,其经济文化类型则大抵相同。但在一定条件下,同一文化系统的各阶段,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发生经济文化类型的变更。甘肃至青海东部的古代文化,正因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当发展到青铜时代时,就发生了经济文化类型的巨大变易,即从锄耕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为以放牧为主的、农牧兼营的畜牧经济。

这里所讲的文化系统,就像黄河中游从仰韶到河南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安阳等阶段的那种有文化继承性的发展系统一样。它的各阶段的文化遗存当然都可以分为若干地区性类型,各类型又都会有自身的承袭系列,但由于基本的共同性,可以把它们归之为一个文化系统。据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年以来的发现,自陕甘交界处至青海的东部农业区(不包括河西走廊的西部),其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甚至到铁器时代之初)的文化遗存,是属于一个发展系统的。这个系统的各阶段,虽有一些支系(即考古学文化中的类型),各支系也存在着互相的影响甚至迁移,由于基本的共同性,应当归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而和别的系统相区别。

但这个系统的文化面貌是极其多样的。迄今为止,曾经被命名为文化或类型的,就有(秦安)大地湾、半坡、庙底沟、(武山)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客省庄二期、(镇原)常山下

层、齐家、(玉门)火烧沟(即四坝)、寺洼、安国式、卡约、唐汪式、辛店乙组(或称张家嘴类型)、辛店甲组(或称姬家川类型)、沙井、骊马等,总计达十九种之多。对于如此众多的文化群,如何分辨清楚它们的关系、找出其发展系列,是大家关心的首要问题和探索其它情况的基础。现在,已经对这个系统的新石器至青铜时代初期的文化序列,有了基本的了解,即是自大地湾经半坡和庙底沟阶段,大概和另一种当地原有的文化相结合(可能是象青海贵南县拉乙亥公社 8021 地点那种无陶新石器遗存发展而来的文化),产生了石岭下那种遗存,再至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及火烧沟⁽¹⁾;而齐家和火烧沟以后的青铜文化遗存,则以青海省的发现为多⁽²⁾。后者如在大通县的上孙家寨、循化县的阿哈特拉山和苏志村、民和县的核桃庄,就发掘了卡约和辛店的墓葬一千六、七百座。得到这样大批的资料,就可看出甘青地区的青铜文化,自齐家以后,主要经历了卡约和寺洼及安国式、唐汪式、辛店乙组、辛店甲组这个阶段,从而进一步明了齐家文化确是从马厂发展而来的,二者并非同时并存。搞清了这个序列,便再也不会感到甘青地区的古代文化头绪纷繁、来源难明了。这对探索古代羌人文化来说,自然是一重大突破,也必将对与西北古文化关系密切的周、秦文化的研究,提供许多新启示。

得到这些新认识,是青海和甘肃的同志们多年辛勤工作的结果。自 1979 年夏天起,我有机会三次来到青海,和北大考古实习队在一起,参加过循化苏志的发掘和上孙家寨、阿哈特拉山及苏志的整理工作,得到卢跃光、许新国同志的很大帮助;并在苏生秀同志的帮助下,观察了核桃庄的材料。正因有这些机缘,今天才有可能谈一些关于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的新认识。应当说,有许多认识是共同得到的。

一 关于卡约文化的基本内涵与类型问题

卡约文化的遗存,虽然早在 1923—1924 年已由安特生(J. G. Andersson)在青海湟中县的卡约村和下西河发现⁽³⁾,但长期以来对它的基本内涵是认识得很不清楚的。例如最初安特生只发现一些单色陶器,大家便以为卡约文化是没有彩陶的;而自 1958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同志们在西宁古城台和湟中朱家寨找到了卡约的彩陶后,就知道它有三角纹、网格纹等图案的彩陶⁽⁴⁾。但后来又经常在卡约遗址中见到所谓唐汪式的彩陶,可是并不真正明白这种彩陶和卡约文化的关系。可以说,十年以前大家对卡约文化的基本特征还是很不清楚的。

1973 年以来,青海省文物考古队发掘了上孙家寨、阿哈特拉山和苏志村等地的卡约墓地,又调查了许多卡约遗址,特别是最近整理了大通和循化的资料,才知道卡约文化是从齐

家文化发展而来的;它本身至少可分为三至四期,所谓唐汪式和辛店乙组的陶器,是从卡约陶器演化而来的。有了这些认识,现在就可以谈一些关于卡约文化基本内涵的问题了。

从墓葬材料看,卡约文化几乎没有细泥陶,即使最细致的泥质陶,质地也比较粗糙。夹砂粗陶的簠和料有砂粒、陶末、云母片等。泥质陶多红胎,但也有灰陶和黑皮陶。粗陶往往因火候不匀而烧成颜色斑驳的红褐色或灰褐色。全部陶器都是手制的。

器形以双耳器为特色。如盛置牲肉用大口双耳罐;装水酒用小口双耳罐或双大耳罐;炊器是粗陶,有的地方以一种堆纹口沿的绳纹罐为主,有的地方则多用绳纹或划纹的双耳罐;还有一些体型较大的壶、瓮类器皿,也常在口部或腹部做出双耳或四耳。卡约墓中不见鬲,但遗址中多鬲,也是一种带双耳的高领袋足鬲(如下西河所出)。

卡约的彩陶,最初沿袭着西部地区齐家文化的传统,有较少的数量,而到晚期则数量增多;但在湟水流域,卡约中、晚期的彩陶都很少。最初的卡约彩陶,是在红陶上施黑彩或深红彩,图案类似齐家彩陶的三角纹和锯齿纹、网格纹。稍后,往往加上红陶衣再施黑彩或深红彩,锯齿纹和网格纹继续存在,又新出现了写实的鹿、羊等动物纹;有一种双线连续凹字纹,目前虽只从这阶段起才见到,但显然是承自齐家彩陶的。再后,出现少量白衣彩陶,而且在黄河沿岸的遗存中,可看到彩陶显著增多,其主要纹饰是网格纹、锯齿形三角纹、波折纹、双线菱形纹、动物纹(仍以鹿、羊纹为主);还有少量的蛙纹。蛙纹尽管在较早的卡约遗存中尚未发现过,但显然是从半山、马厂、齐家的同类花纹变化而来的。

再往后,彩陶突然盛行,尤其是在黄河沿岸地区,随葬陶器往往以彩陶为主。这个新时期的彩陶,开始一阶段仍以三角网纹(或称勿字纹)、双线连续凹字纹、双线菱形纹为主;第二阶段忽然盛行旋涡纹,即唐汪式彩陶上最多见的那种花纹。但新出现一种白衣上红、黑两色相间的波形纹,已启辛店乙组彩陶中多见的红、黑相间的双钩羊头纹的先河。据民和核桃庄材料,第三阶段除唐汪式旋涡纹继续有少量遗存外,还流行彩色双钩羊头纹、双线波形鸟纹,即辛店乙组的典型彩陶。像辛店甲组那种黑线描绘的方折整齐连续回字纹、羊头纹和更为生动的鹿、狗等动物纹,则是更晚才出现的。在包括了上述四大阶段的这个新时期,陶器群面貌的整体已有很大变化,按照已有的传统观念,宜于统统归入辛店文化的范畴。

卡约墓中多青铜器。习见小刀、镰、戈、矛、钺、镞、铃、泡、联珠状臂饰、镜等,只有工具、武器和服饰用物,不见容器,更无铁器,可见处于青铜时代。装饰品中还多玉、石、玛瑙、松石等珠饰和贝。在遗址中,则常可采集到打制的石质敲砸器,磨制的石斧和半月形石刀,还有黑曜石和燧石的细石器。这些石器和青铜工具,既有畜牧、狩猎用物,又有农耕工具。在遗址中,还曾见到过大量的鱼骨。墓葬中则习用粟和羊、牛、马、猪、狗和鹿的肢体随葬。这些情况,加上彩陶上多见的羊、鹿等动物图案,说明卡约的经济应是兼有农、牧和渔猎,而总的

来说则是畜牧经济。大概正是因为以畜牧业为主,遗址的堆积都比较薄,表明其居民一般不在一个地点长期定居。

卡约的葬俗,其墓形有竖井土坑和横穴洞室两种。木棺或有或无。葬式有仰身直肢、乱骨迁葬、二次扰乱上身的伸直葬、俯身葬和大葬数种。多殉羊、牛、马、猪、鹿和狗,偶有殉人。

1981年在苏志还发掘到两座自卡约中期至晚期的坟丘墓。每个坟丘都用夯土筑成一个长约20—24米、宽约16—18米、高约1.5米的土堆,坟丘两侧,又各有一条平面作弧形弯曲的围墓沟,两端似要合拢而以石子路或土路隔开。围墓沟是在坟丘基本筑好后才挖的,挖好沟后,又先在沟内埋棺,再在坟丘顶上挖坑埋墓。在2号坟丘的围墓沟外,还发现六个安放木桩的柱穴。木桩当是祭祀用物。这两个坟丘,分别埋墓16和10座。两个坟丘距离很近,丘内各墓,又是先2号坟丘、后1号坟丘,而在每个坟丘内,又皆为先围墓沟、后在坟丘顶部埋墓,在丘顶的诸墓,又大体是自南而北,依次埋葬。这种坟丘,如果是氏族墓地,同时期的墓应该很多,但这两个坟丘上的26座墓葬,却可清楚地分为五个连续的小段,说明当是一个家族的成员依次而在此埋葬的。

卡约墓葬发现的总数已经很多,但这种坟丘墓却是少见的。筑成这样一个坟丘,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说,显然不是普通的个体家庭所能承担的,也不像由亲缘关系而联合起来的几个家庭联合修成的。看来,这当是部落中的显贵成员,利用了氏族或部落成员的协作力量完成的工程。不过,这两个坟丘内包括的各墓,同其它地点发现的卡约墓葬相比,看不出有明显的贫富差别。当时大概还处在阶级刚刚分化的军事民主制阶段。根据上孙家寨M723和M1026妇女墓中随葬品最为丰富的情况(M723有铜泡400余件,M1026有铜泡和联珠状铜臂饰50余件),说明至少在某些卡约部落中,母权制还是比较牢固的。

关于卡约成员的寿命情况,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康信同志对阿哈特拉山156个人骨(包括17个属于较晚的唐汪阶段的人骨)的鉴定,平均年龄只有27.2岁。当时的生活环境,无疑是十分困难的。

上面所述,就是目前了解到的卡约文化的一些基本情况。

但卡约文化的这些内涵,在不同的分布区却是有所区别的,也就是说,卡约文化显然可分为不同的区域类型。

卡约的分布范围,东起甘青交界处黄河沿岸的永靖、循化等地,西至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共和、贵南等县,南至黄南藏族自治州,北至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刚察、海晏等县。在这一大片范围内,黄河沿岸与湟水流域的卡约文化,属于两个不同的类型。

黄河沿岸的卡约文化,可以拿循化阿哈特拉山和苏志村的遗存为代表。这个类型,彩陶较多,上面所讲卡约彩陶的发展过程,在这里有比较充分的表现。炊器主要是堆纹口沿罐。

墓葬全是竖穴土坑,全有木棺,并多火葬,有的甚至将墓圻的壁、底都烧红薰黑。墓向基本为南北向。

湟水流域的卡约文化,可以拿大通上孙家寨的遗存为代表;湟中县卡约村和下西河的遗存,也属这个类型。这一类型,彩陶较少,几乎不见动物纹。炊器多用绳纹或划纹的粗陶双耳罐。墓葬除竖穴土坑外,多横穴墓,往往不用木棺。墓向基本为东西方向。

卡约文化的地区类型,可能不止这两个。其实,如果再扩大一点眼界来考察,甘肃洮河流域至子午岭西侧的寺洼文化以及安国式遗存(有的同志以为所谓安国式就是寺洼文化的晚期遗存),也可以说同卡约是一个文化的不同类型。

例如寺洼的陶器,也以砂粒和陶末为臠和料,也几乎不见细泥陶,陶质都比较粗松。在安国式遗存中,黑皮陶虽然好像比较发达,但通常所说的寺洼或安国式的黑皮陶,时代属殷周之际或周初,而这个时期的卡约遗存,光亮的黑皮陶也比较多。夹砂粗陶的色泽,亦同卡约接近。就制法而言,也不见轮制陶器。

又如寺洼陶器的形态,亦以盛行双耳器为特色。寺洼中特别发达的马鞍形器口,在卡约遗存中虽然数量较少,但也存在着。这种马鞍形器口,在我国出现于马厂陶器中,盛行于寺洼及安国式,后来,又在川北岷江上游的理县、茂汶羌族自治县一带的战国末至汉初的石板墓中的陶器上经常见到。寺洼文化早已被推定是氐羌的一支遗存⁽⁶⁾,岷江上游的石板墓则应是冉駹的遗存⁽⁶⁾,而冉駹也正是“氐类”(《汉书·西南夷传》)。岷江上游的石板墓同寺洼文化显然有前后相承的关系。从这些情况看,卡约和寺洼都有马鞍形器口,又说明了它们之间重要的亲缘关系。

还如彩陶。过去有的同志以为卡约有彩陶而寺洼无彩陶,但最近在甘肃庄浪县李家咀找到的寺洼的马鞍形口双耳罐,有的就是通体施彩陶图案⁽⁷⁾。尽管寺洼的彩陶的确不如卡约那么多,可是二者都有类似的彩陶这一点,毕竟还是共同的。

再以葬俗来说,过去以为只有寺洼流行火葬而卡约无火葬,但最近在苏志的卡约墓地中,亦发现了好几座火葬墓。

卡约文化现在已知经历了近千年的时间(详下),而寺洼文化的发展序列还没有排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笼统比较二者的面貌,人们就可能拿较早的卡约遗物来和时代要晚得多的寺洼遗物相比,这必将扩大二者的差别。我相信,等将来把寺洼的分期弄清楚,人们拿同时期的卡约、寺洼遗物作比较,这两个文化的共同性就一目了然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面所以举出许多卡约和寺洼的共同性,并不意味着现在应当取消寺洼文化的名称,而是为了说明这两个文化,犹如江汉流域的青龙泉三期和季家湖下层的的关系那样,实质上是属于一个大文化系统的。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利用现在对卡约文化发展

序列的了解,加快今后探索寺洼分期及其渊源和去向的步伐。

二 关于卡约和寺洼文化的来源问题

在陕西西部至甘肃东部的陕甘交界地带,是黄河中游至渭河流域的原始文化和甘青原始文化的交错并存区。这里不仅有大地湾文化的若干遗址以及丰富的半坡、庙底沟、客省庄二期这个系列的遗存,而且有石岭下、齐家等遗存。看来,东、西两个系统的原始文化,曾在这个地区此进彼退地交错落过脚。其中的齐家文化,东端即达宝鸡地区;它在这陕甘交界处,大概是以取代客省庄二期文化而存在的。齐家的西端,大抵达到河西走廊的东部和青海的东部农业区;而在河西走廊的西部,则有相当于齐家阶段的火烧沟文化。近年来,由于资料积累逐渐增多,对于齐家文化的来源及其类型问题,已经展开了一定的探讨⁽⁸⁾,但关于齐家文化的去向,直到不久以前,还因线索不明而几乎没有涉及到。

在甘青地区进行的野外考古,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了。不能设想,由分布范围那样广阔的齐家文化所演变成的后一种文化遗存,至今还没有找到过。问题一定在于虽已发现而还没有认识到。

现在,由于在民和县山家头、大通县上孙家寨和循化县阿哈特拉山都已发现了齐家向卡约过渡的遗存,由齐家发展为卡约的线索已经极为明朗了。从齐家向寺洼过渡的中间遗存,现在虽然还没有找到,但从上述卡约和寺洼的亲缘面貌来看,寺洼是由齐家某一类型发展而来的关系,也已经可以作肯定性的推测了。

由齐家向卡约过渡的遗存,以青海民和县山家头的 M4、M23 为已知的最初之例。这两座墓的随葬品,各有粗陶的堆纹口沿罐、泥质橙红陶的双大耳罐、泥质红陶的小口双耳罐、夹砂橙红陶的碗,有的还有粗砂橙黄陶的大罐。这已基本是卡约墓的陶器组合,而卡约墓中普遍出现的大口双耳罐,这时尚为齐家式的碗;尤其是双大耳罐,还保留着强烈的齐家风格。

再稍后一阶段的卡约遗存,仍保留着明显的齐家风格的痕迹。这些遗存是大通上孙家寨的 M13 和循化阿哈特拉山的 M91、M123 和 M179。

上孙家寨的 M13,出有大口双耳罐、堆纹口沿绳纹罐、短颈腹耳壶和彩陶双大耳罐各一件。阿哈特拉山的 M123 出了大口双耳罐一件; M91 有大口双耳罐、小口双耳罐、堆纹口沿绳纹罐各一件; M179 有彩陶大口双耳罐、小口双耳罐、堆纹口沿绳纹罐各一件。各种陶器,都同上述山家头的同类器物有形态相承的演化痕迹。如作更具体的分析,则那种堆纹口沿罐,在永靖大河庄的齐家遗存中,就已有了形态接近之器;而阿哈特拉的大口双耳罐,其折腹形态又近似于武威皇娘娘台齐家遗物中的同类陶器;至于上孙家寨的那件双大耳折腹罐,则

更是从齐家文化中多见的双大耳罐发展而来的。这几座墓的陶器形态,进一步表明了卡约承自齐家的关系。

上孙家寨和阿哈特拉山的两件彩陶的图案,更清楚地表明了这种继承性。上孙家寨的彩陶双大耳罐,在红陶上施深红彩,这本是齐家文化的作风;而它同阿哈特拉的彩陶双大耳罐,又都以瘦长的重线三角纹为花纹主体,这又是齐家的风格。具体说,上孙家寨 M13 的双大耳罐其口沿有一周网格纹,腹部施四个竖三角纹,其两侧又各用一、二道竖条纹作陪衬。这种在腹部主体花纹两侧陪衬竖条纹的图案布局,正极接近于武威皇娘娘台的齐家彩陶罐;而网格纹则在乐都柳湾的齐家彩陶上,亦已经出现。又如阿哈特拉山 M179 的大口双耳罐腹部所见六组四道重线组成的对立三角纹,亦是乐都柳湾等地青海东部齐家彩陶上的流行图案⁽⁹⁾。总之,这两件彩陶源自齐家的风格,是一望即知的。

有了这些材料,就可以认为齐家文化在西部地区发展为卡约文化,而在其东部地区则发展为寺洼文化,乃至安国式遗存。当然,要清楚说明这种分头两路的演化过程,还需要对齐家文化作进一步的类型分析,更要搞清寺洼和安国式的序列,找到它们的早期遗存。不过,现有材料所透露出的齐家彩陶以西部地区较多(更西的火烧沟文化彩陶更多)等情况,已多少暗示出寺洼彩陶较少的历史原因,便在于其前身即彩陶较少。

最近,韩康信同志在西宁又观察了一批卡约人骨,看到卡约人种的体质特征是接近于现代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也就是过去步达生(D. Black)所说的近似于现代华北人种。这同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及齐家的人种是基本一样的⁽¹⁰⁾。人种学方面的证据,又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卡约直接承袭齐家的关系。

三 关于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的关系问题

辛店文化由于其不同群体有各自的特征,过去曾有过好几种名称。

1924 年安特生在甘肃广河县辛店发现的那种遗存,自五十年代末以来,通常称之为辛店甲组;后来,甘肃省博物馆的同志又叫做辛店文化的姬家川类型。

1958 年黄河水库考古队在甘肃永靖张家咀发掘的那种辛店遗存,随着辛店甲组的命名而被称之为辛店乙组;后来,甘肃省博物馆的同志则叫做张家咀类型。

1956 年黄河水库考古队在甘肃东乡自治县唐汪川山神收集的那种类似于上述辛店遗物的陶器,曾习称为唐汪式遗物。有的同志以为这是一种可以独自划分出来的唐汪文化的遗物,有的同志则把它归入辛店文化之中。

关于这几种遗存的年代关系,有的同志以为唐汪最早,乙组次之,甲组最晚;有的同志则

以为甲组早于乙组;有的同志又以为唐汪与乙组可能并存⁽¹¹⁾。

至于这几种遗存与卡约及寺洼的关系,直到不久以前,相当多的同志还以为要早于卡约、寺洼。作出这种判断,虽然没有清楚的层位关系作根据,也没有说明具体理由,我想,其出发点不外乎考虑到这几种遗存皆彩陶发达,而彩陶发达正是马厂及其以前的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的重要特点。

但在上孙家寨的发掘中,则发现了出唐汪式或辛店乙组陶器之墓打破出卡约陶器之墓的例子,已达七组;而且,通过最近对上孙家寨和阿哈特拉山两批墓葬的陶器的类型学分析,又清楚地看出唐汪式和辛店乙组的陶器,就是由卡约陶器逐步演变出来的。

上孙家寨的一至四期墓,都属卡约文化;第五、六期墓普遍出唐汪式陶器;第七期墓则是辛店乙组陶器与唐汪式陶器并存。

阿哈特拉山的前三期墓,亦都属卡约文化。第四期墓就以彩陶为主,但不同于唐汪式,而以双线菱形纹、双线连续凹字纹等纹饰为主;其双大耳罐等器形,又是唐汪式双大耳罐的前身形态。第五期墓的早期,则有类似于四期墓那种双线菱形纹彩陶与唐汪式的旋涡纹彩陶并存的现象;还有一种在白衣上施红、黑双色相间的波形纹彩陶,已颇具辛店乙组彩陶的作风。第五期墓的晚期,则只出唐汪式彩陶。在阿哈特拉,没有出现标准的辛店乙组陶器。

这两个序列,表明卡约文化是早于唐汪式的,而二者之间,还有阿哈特拉第四期墓这一阶段;唐汪式的发生,要早于辛店乙组,不过后来二者曾并存过一段时间。至于辛店乙组彩陶的那种风格,则早在唐汪式陶器盛行时期就已萌芽。

如进一步分析随葬品的组合关系和器物的形态,唐汪式和辛店乙组是从卡约文化逐步演变过来的迹象就更为清楚。

就组合关系说,上孙家寨和阿哈特拉山的各期墓葬,不论是卡约的还是唐汪式或辛店乙组的,都以三种陶器为基本组合,即以堆纹口沿的绳纹罐或双耳的绳纹、划纹罐为炊器,大口双耳罐为盛肉器(到唐汪阶段前后,或用双大耳罐代替),小口双耳罐为盛水酒器(在卡约的较早阶段,双耳较小,唐汪阶段后成为双大耳罐);此外,各期又都有腹耳壶等器。随葬品组合基本无变化的现象,说明了各期文化的直接继承性。

在器物形态方面,这几种东西又都有一脉相承的演变关系。这里,可以举唐汪式陶器中的一种典型器物——旋涡纹黑彩的红陶双耳罐的演变过程,来作些具体说明。这种器物,在卡约文化的较早时期,本是小口、短颈、垂腹及双小耳,后来颈部逐渐增高,双耳也跟着慢慢变长,逐步变成唐汪式的长颈双大耳罐。可举辛店乙组中的一种典型器物——带双线波形鸟纹或羊头纹彩绘的腹耳壶说明之。这种腹耳壶,在卡约的较早时期,颈部甚短,后来慢慢增高,最后口沿外侈,腹部作椭圆形,成为辛店乙组那种侈沿、长颈、溜肩、椭圆形腹的形态。

在文末所附卡约——辛店文化的分期图中,可以看到这些器物的形态演化过程是一线相连,没有间断或跳跃,说明在这两个地点所见从卡约到唐汪及辛店乙组的发展过程,已经没有太多的缺环了。

根据这两个序列,可知卡约文化大概先在黄河沿岸的一些地方,再一次发展起彩陶,出现了大量使用双线连续凹字纹和菱形纹的阿哈特拉第四期,后来又演变为唐汪式遗存。就整个河湟之间的地区来说,再后则进一步发展成辛店乙组遗存。像辛店乙组彩陶的那种双钩纹彩绘,在唐汪阶段已有萌芽,而当这种特征性因素完全成熟时,唐汪式陶器并未完全消失,所以二者曾并存一段时间。

至于湟水流域的唐汪式遗存,据上孙家寨的早期阶段墓(第五期),双大耳罐多数是通体灰黑,没有彩绘,红陶的大口双耳罐亦不见彩绘,而唐汪式的旋涡纹彩陶,只是到再晚一期(第六期)才大量流行。这又进一步说明,直到唐汪阶段,彩陶还是先在黄河沿岸地带发达起来的。黄河沿岸和湟水流域唐汪阶段的差别性,自然还是卡约阶段旧有差别的继续,表明这两个流域的唐汪式遗存也是属于两个类型的。青海省的同志把湟水流域的唐汪式遗存叫上孙类型,正可表现出这个阶段的遗存是有其自身地区特征的。

在上孙家寨和阿哈特拉山,没有找到辛店甲组的遗存。但1978年以后在民和核桃庄发掘的三百五、六十座辛店墓葬,则是甲、乙组都有,而且还包括一种过去从未见过的晚于甲组的辛店墓葬。就地层关系说,这里有好多甲组墓打破乙组墓的例子。

这些辛店墓可分为三大期。各期随葬陶器的组合,同卡约的基本一致而略有变化,即一般是腹耳壶、双大耳罐和大口双耳罐各一件,而腹耳壶体型增大,双大耳罐缩小,使得腹耳壶在整个组合中占有最突出的位置。

第一期大体属于辛店乙组阶段,但又可分为三小段。第一段以波形鸟纹的彩陶腹耳壶、素陶或双钩羊头纹彩陶的双大耳罐、彩陶大口双耳罐等所谓辛店乙组的陶器为主,但还有少量的唐汪式旋涡纹彩陶双大耳罐,显然相当于上孙家寨第七期。第二段全都是辛店乙组的那种波形鸟纹彩陶腹耳壶、双钩羊头纹彩陶双大耳罐和彩陶大口双耳罐。第三段腹耳壶上的波形鸟纹多已变成写实的鸟纹。通贯三段的腹耳壶,其肩部呈现了由溜肩转为折肩的趋向,而折肩正是辛店甲组的腹耳壶的特征之一。

第二期大体属于辛店甲组阶段。也可分为三小段。第一段的腹耳壶,有一半仍饰以写实的鸟纹,但折肩作风比过去突出,已基本具有辛店甲组的特点;另一半则饰以黑彩的连续回字纹和双线羊头纹,这正是过去所谓的辛店甲组彩陶的特征。从第二段起,腹耳壶的口部往往变大,黑彩的羊头纹除少量还用双线勾画外,多数是由比较粗糙的单线描出,并且,从前已经少见的简化蛙纹这阶段却又增多;简化蛙纹当然也是用黑线描出的。此外,双大耳罐上的

羊头纹、也往往作成单线黑彩。到第三段时,腹耳壶的颈部已由过去的外侈状变为直颈状,底部也略为扩大,使整个体型变得更修长些。壶腹上的羊头纹已全部是粗糙的单线黑彩,简化蛙纹仍占一定比例。

第三期是新见到的一种遗存。其陶器组合虽然未变,腹耳壶则逐渐变为以灰色素陶为主,并且有的双大耳罐也变成素陶;当然大部分双大耳罐、大口双耳罐及少量的腹耳壶,仍为彩陶。其纹饰,或是更粗陋的黑线简化蛙纹,或是简单的红彩三角纹带或平行横条纹带。至于腹耳壶的器型,则有的腹部更为瘦高,有的在腹下部作突然收缩,有的在腹下部作缓慢收缩而成椭圆形。如果不管整组陶器情况,单就这种腹耳壶来说,可能会认不出它是属于辛店文化的。这种陶器形态既然已同典型的辛店遗物有较大差别,自然已到了辛店文化的边缘阶段。

把山家头、上孙家寨、阿哈特拉山、核桃庄等地的材料连贯起来,从齐家发展为卡约再发展为辛店的序列,已经是比较清楚的了。它们既是同一种性质文化的连续发展,也许应当用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名称来概括它们,把唐汪、乙组、甲组等名称都作为卡约文化的某某期来处理。

但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只是代表着占据一定空间、一定时间和具有一定特征的一种文化遗存。一个连续发展的共同体的遗存,如果不同阶段的特征差异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使用好几个考古学文化的名称。例如大汶口和龙山文化,明明是同一个连续发展的人们共同体的遗存,由于两大阶段的文化特征有明显差别,大家就使用着两个名称。从齐家到卡约、寺洼,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采用着不同的文化名称。从卡约、寺洼到辛店,当然也应这样来处理。

对于任何一个文化发展系列来说,都应当抓住其突出变化的环节,划分阶段。像卡约、寺洼至辛店这个系列,就显而易见的彩陶使用情况而言,把它分为缺乏彩陶和彩陶发达这两大阶段,特征既明朗,又能照顾到已有的传统习惯,那么,把这个系列的前一大阶段仍然称为卡约文化,后一大阶段则统称为辛店文化,可能就比较合适了。当然,等今后把辛店文化的区域特征寻找得更清楚以后,后一阶段可能也会像前一阶段那样,出现另一个或更多的文化名称。

如果这样处理,前一大阶段的卡约文化,至少可以有黄河沿岸的阿哈特拉类型和湟水流域的上孙类型。卡约的阿哈特拉类型已知有三期,上孙类型则至少包括四期。这仍然是过去概念的继续。

但辛店文化的概念,由于新增加了许多内容,就需要给予一定的调整和补充。

要对辛店文化这一概念作新的规定,最好是先分清它的区域类型。就已知材料来说,永